

2022

高教人眼中的2022——

我记录,我思考



编者按

即将过去的2022年,是高等教育史上“匆匆又匆匆”的一年。线上、线下课程、师生健康安全……生与死、冰与火的考验让这一年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痕。

如果将高等教育界比作一个生态,那么在作为生态中每一分子的高教人眼中,2022年又给他们留下了哪些难忘的印象,有哪些人和事、观点与趋势发人深省?

为了走进真实的2022年,我们特邀请高校管理者、高等教育专家、一线教师以及学生,从不同视角记录他们眼中的2022。让我们一起在记录中思考,在思考中更好地出发。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席酉民:

用一次“寻找”唤起一场“讨论”

几年前,我刚刚担任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时,有人对我说:“你要想改变中国的教育,首先要改变中国的家长。”

当时我对他说:“这样的说法并不全面。”近年来,中国教育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教育从业者,又各有各的烦恼。在我看来,这两者并不矛盾,只是一件事物的不同侧面——在规模和质量上,我们确实进步了,但公众与社会对教育的理解、认知和诉求依然存在很大差异。

在计划经济时代,所谓“教育”基本等同于学校教育。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家庭和社会对学生的影响日益增大,甚至在某些方面有超越学校教育之势。正因如此,只影响家长并不足以改变中国教育。当前,我们急需一场全社会关于教育的大讨论,让大家真正认知未来社会可能的形态是怎样的,孩子怎样才能真正驰骋未来,教育如何帮助孩子和社会成功走进未来。

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在热心人士和组织的捐资支持下,我们于2021年底发起了首届“寻找新时代中国杰出教育家”行动。

这次行动持续了2022年整整一年,通过寻找、评选与论道,促进并引导社会开展了一场关于未来人才及教育的大讨论,帮助孩子健康成长、父母减少焦虑、教育回归本质、社会走出困局。

首届“寻找”在今年的“双11”落下帷幕,我们选出了上海大学原校长杨德广、北京第二实

验小学副校长华应龙等5位来自不同教育领域的教育家。然而,树立5位教育“榜样”并不是此次活动的目的,至少不是主要目的。

作为持续一年的行动,每一步我们都设法引起社会大众对教育的关注与讨论。比如,通过设置多场开放给公众的教育家对话,邀请公众挑战教育家,并参与反思和讨论。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但借助网络技术,每场活动的参与人次都在百万以上。整个活动下来,累计有千万人次融入其中,最后的论道峰会及颁奖仪式更有三四百万人通过网络参与。我相信参与者及关注我们行动的人士,会从这些与不同领域教育家的对话中获得启示,进而引发整个社会对于教育未来该如何发展的深思。

应该说,首届“寻找”行动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未来,我们会总结经验,使活动越办越好。但我们也知道,真正能“找到”的教育家数量不会太多,不过这项活动的真正价值也不在于找到某些“人”,而在于“寻找”本身,更在于此过程中,各界参与者和关注者对教育本质的更深理解,并通过他们的行动,不断升级中国的教育。

当然,作为一所高校,组织这样的活动并不是我们的“主业”。甚至可以说,这只是我们主张和组织的一项社会公益活动。而在“主业”方面,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相对更加严重的冲击,我们没有退缩,而是逆风飞翔,取得了很多人令人惊奇的发展。

这当然是一件很富有挑战的事情。一般而言,面对困难,能平稳走过已属不易,而要将危机看成是机会甚至是一种资源,则需要大胆和智慧的行动。其实,很多危机是无法回避的,但以何种态度面对却可以自主选择——是仅满足于度过危机,还是以更积极、阳光的心态转化危机?这一选择对于一所大学来说非常重要。

比如,在疫情形势严峻的国庆期间,我们没有选择取消学生的假期,而是顶住压力,按照原定规划放了假,但同时也告诉学生:“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的假期,学校坚守了原有的规划,那么你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你们应该有的行为又是什么?”如此,这一原本对教学的挑战变成了教育学生的宝贵教学“资源”。

在这种坚持和探索下,我们开启了利于学生根据兴趣自我导向学习的“扩展学习计划”,建设了支持西浦学生和面向全球学习者的学习超市,我们西浦创业家学院(太仓)校园已启用,我们创建的融合式教育模式明年将迎来首批毕业生……

事实上,无论是对于教育家的寻找,还是对自身教育事业的坚守,我们都是想通过自身努力,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能给人们提供一些思考和探索,并形成帮助人们审视复杂未来的认知框架,从而从容走进未来。这也是所有真正关心中国教育的人应该做的。

(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回望2022年,我经历了出国交换、回国隔离、线下返校、线上上课等种种起伏跌宕的大学生活。而迈入本科最后一年的我,也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中,努力抓住了对未来的一点确定性。

2月初,在奥密克戎尚在欧洲肆虐的节点,我赴巴黎政治学院开始了为期半年的交换生活,我由此也成为了我们这一届学生中,为数不多真正走到线下交换的学生。

抵达巴黎后不到一周,俄乌战火便在欧洲东部燃起,我亲眼见证了上周还在餐厅一起谈笑风生的乌克兰朋友在社交网站上慷慨陈词,在线下四处奔走,目睹了俄罗斯朋友的局促与不安,街上的游行接连不断……那是我第一次感到世界的冲突与动荡离自己如此之近。

这段交换经历让我在体验欧洲风土人情,沉浸在其艺术、政治、文化之中的同时,也逐渐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打算。于海外,我终究是一个局外人,而我更希望在中国发展变化的关键节点,成为见证者、亲历者与建设者。

外部环境的动荡不安之下,个人的发展路径也时常令人迷惘。保研、就业、出国是北大本科生最常选择的三条出路。但直到2022年上半年,我仍在这三条道路中徘徊纠结。然而,2022年就业市场遭遇“寒冬”,出国环境尚不明朗,使得包括我在内的更多同学最终选择了在国内继续读研。同时,近几年许多研究生项目名额的缩减,也使得保研的焦虑从需要直保保研面试的大三学生,蔓延至此前提前筹划的大二乃至大一的同学。

校内各类学生组织及校外机构都在以各种形式为大三生提供保研经验辅导,大一、大二同学也早早开始为自己的课程、科研与实践作出规划,甚至在今年考后的招生阶段,已经有不少学生和家长在咨询保研事宜,这是我们入学时几乎从未有过的现象。

在北大元培学院,我们借助学生组织的力量,通过组织各方向的新生进行选课指导、新老生交流会、导师交流会、保研出国交流会及各类学长学姐采访等,呈现更多选择与可能性,在焦虑面前尽可能帮助学弟学妹们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前做好准备。

这一年,我目睹了上半年校内同学于疫情不确定性下的生活,也亲历了下半年疫情形势趋于严峻的境遇。在我返校后的下半年,诸多课程实践和田野调查还在翘首以盼年底成行,然而11月开始肆虐的疫情让这些实践再次停摆。至12月初,师生均在同病毒抗争的过程中完成了最后一段课程和期末考试。

作为2019年秋季入学、仅经历过4个月非疫情大学生活的本科生,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活更像是我们的“常态化”大学生活。我们也曾幻想过丰富的国际交流、频繁的田野实践,但这势必无法成为我们大学生活中触手可及的机会。线上教学固然提供了一些与校外乃至海外学者的交流机会,但其互动性、参与感、专注度都很难与线下相提并论,我几乎已经忘却刚入学时,挤进人山人海的学术讲座现场是何种体验。这四年间所失去的诸多线下师生交流机会,始终成为我的遗憾。

在这动荡的生活中,值得欣慰的是老师们永远在第一线给予我们抚慰;周围的同学和朋友也成为物质与精神支撑的直接来源。“谈困境,找出路”,这是年底我参与的一次元培学院社科学会导师交流会的主题,在疫情、学业、个人与社会发展的种种迷茫、困惑与思考在线上相互碰撞,在得到理解与回应的同时也逐渐明朗。

这一年,无疑在种种不确定性下充满各种遗憾。而这一年,我最大的成长也在于对未知的种种不确定性更加有准备。在筹备各类学术及社团活动的同时,做好线下与线上多个方案已成为常态;在制定个人规划的过程中,长期准备多条路径,短期“及时行乐”也成为如今的预期习惯。未雨绸缪,把握机遇,便能在动荡不安的不确定性中抓住那些可以掌握的确切性。



在北京大学元培学院2019级本科生李丛予: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



中国科学院院士、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房喻:

师范教育“破局”当此时

2022年底,我参加了一次很有意义的会议。两年前,上海交通大学正式成立教育学院。在成立两周年之际,学院召开了一次顾问委员战略咨询会,我受邀参会并受聘为该院2022年顾问委员会主任之一。

事实上,在上海交大计划成立教育学院之初,该校常务副校长丁奎岭院士就曾和我聊起过此事,当时我便表达了极力赞成之意。因为在我看来,综合类院校,尤其是如上海交大这样的高水平综合类院校成立教育学院,是目前我国师范类教育“破局”的重要途径,而作为一位浸淫师范教育几十年的老“师范人”,我觉得目前的师范教育也的确到了需要“破局”的时候。

在我国,师范教育由来已久,但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教师的数量问题,即为基础教育提供基本的师资保障。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教育事业的

不断进步,在全国范围内,我国基础教育师资供需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数量问题,取而代之的是优秀师资的补充。

此时,吸引高质量的大学生群体进入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些学生又往往存在于高水平大学中。

以上海交大教育学院为例。在会议上我得知,该学院开设的教育硕士专业,其大部分生源都来自原“985工程”高校,其生源质量自然有保证。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时已经22岁甚至更大,他们对于未来职业的规划显然比高中毕业时更加清晰和坚定。这就意味着这些高质量的学生在毕业后,更容易进入并最终留在教师队伍中。

事实上,早在几年前,我国在国家层面就已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比如在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便已经发文,明确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推动一批有基础的高水平综

合大学成立教师教育学院,设立师范专业。上海交大教育学院也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今年5月,广东省教育厅在其下发的《广东“新师范”建设实施方案(2022—2025年)》中,也明确提出要在省内推进3-5所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建设教师教育学院。

这些显然都有助于我国师范教育的改革与提质。除此之外,在当下“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传统师范类院校对于自身发展道路的规划也需要多一分定力。我个人对于近年来某些师范类院校盲目追求所谓“世界一流”的行为很不以为然。要知道,在各主要发达国家,其实并没有所谓“师范专业”,而作为“本土”专业,国内师范院校与其强求形式上的所谓“世界一流”,反倒不如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把专业学科建设搞上去。

具体而言,也就是尽量提升学生对某一类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尤小立:

“新文科”建设的勃兴和展望

2018年5月,教育部正式做出全面推进大学“新文科”建设的决定。从这一年算起,2022年应该是“新文科”建设的第五个年头。或许是受2021年教育部首批1011个“新文科研究与改革项目”的促进,2022年也是相关研究成果呈井喷之势的一年。

据我的不完全统计,2022年以“新文科”为主题发表的论文不少于1400篇,较之2021年多出了400多篇,也是2020年相关论文发表数量的4.5倍,更是2019年的17倍。

与此相适应,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依托山东大学成立的“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在2022年创刊出版了《新文科理论与实践》集刊,一些省市的“哲学社会科学年会”也增加以“新文科”为研讨对象的活动。

从2021年11月至2022年底,大学中与“新文科”建设相关的体制变化,或许数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最为典型。这两所大学先后将改革开放后重新恢复设立了几十年的人文学院分拆扩充为哲学、历史和文学三个院系。其中,以理工专业见长的浙江大学的变化更值得关注。

多年前,我曾赴浙大参与学术研讨,印象

极深的是承办研讨会的某人文系科,办公空间逼仄、人员不足。但这几年,浙大不仅设立了“文科资深教授”岗位,引进了多位知名专家,如今筹建了独立的文科学院,这对所有经历过1952年“院系调整”后专职理工专业,在文科专业建设上举棋不定,甚或反复的院校都应是一个触动和启发。

然而,有关“新文科”建设上的诸多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思考。教育部“新文科研究与改革项目”分重大、一般和委托三类,完成期限为两年,经费发放分别是15万元和10万元。这些项目固然侧重实际操作,但发表成果是基本要求。由此衡量,2022年发表的1400多篇论文即使均由“国家项目”支持,一年仅一篇成果,也不可能达到“国家项目”的基本要求,而平均5万元一篇的经费投入,成本也明显过高。

因为概念尚不明确,“新文科”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比如,一篇名刊上的名家之作就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某学科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一并归入“新文科”。这等于在说“过去”也是“新”,只要延续原来的路径,“新”就可以自然呈现。如此,“新文科”建设的时代价值就不存在了。

2022年发表的有关“新文科”建设的论文,多数标题都不约而同被冠以“新文科背景下”之类的修饰语,内容则仅涉及具体学科或课程。而即便是具体改革的“实践报告”,也应显示出普遍适用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如此才能与国家项目的地位、国家经费投入的要求相匹配。然而遗憾的是,大多数论文流于空泛和口号。

按照最早提出“新文科”概念的美国希拉姆学院的做法,它们显然是偏重“通识”的,这也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某些著名高校恢复设置人文学院的初衷相吻合,但此次浙江大学和厦门大学分拆人文学院的做法,似乎又是在讲究“专业”。

不仅如此,近年来大学的“专业性”追求也有走极端的趋势。“专业性”往往被片面理解为“理工化”。因此,新建的几所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或香港科技大学为模板的研究型大学,都没有设置学术意义上的“文科”。但事实上,无论是加州理工还是香港科大,其学术性“文科”不仅存在,而且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准。

学科的理解和认识。要知道,对于一名老师而言,能不能做一手漂亮的PPT并不重要,对某些“教学技巧”的掌握与否也不是什么关键问题。决定一名老师教学能力高下的核心因素,在于其对教育的热爱、对所授学科的理解程度,以及对相关学科前沿内容的掌握程度。他们只有真正“掌握”一门学科,并站在学科之外,成系统地讲授相关知识,才能成为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老师。

今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摆放在一起,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科技的发展靠的是人才,人才又需要靠教育培养。当然,这里的“教育”并不单指高等教育,而是从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教育系统。事实上,在对人才的某些特质早期发现、早期培养的工作中,中小学教育所发挥的作用更重要。从这个角度上说,目前某些过于追求中小学生的“全面发展”的做法是否合适,也是值得商榷的。

总之,面对我国人才教育的新形势,一支高质量教师队伍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而要打造这样一支队伍,则反向要求师范教育必须突破传统的教育模式。这样的“破局”,从当下就应该开始了。

(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讨论“新文科”时,常有学者论及“中国特色”,其合理性不言而喻。但“中国特色”不能简单等同于古代文化传统。鉴于“大学”是19世纪末传入中国的文化机构,理应包括近现代中国形成的“新传统”。所以,我们谈“新文科”就不能越过“新传统”中显示出的会通中西的气象。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也绝不是抽象的,还要考虑当下现实。就“新文科”建设而言,它不仅需要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相协调,也需要与国立大学的定位保持一致。而国立大学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将全民族的文化水准提高到符合时代要求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文科”建设只能以通识教育为基础。

对“理工化”的过分强调是基于近几十年来“抓重点”的思维模式,而该思维模式已不适应当下现实。以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完全具备高等教育普惠制和多元发展的条件,再讲“抓重点”反而无法展示时代精神和责任。

就教育而言,“拔尖人才”也不是“重点培养”就必然见效的。学校能做的更多是提供多样的成长环境和条件,而不是一味地拔苗助长。“通识化”的本科教育基础上,发展以专业性为主的研究型教育。

而无论是“新文科”建设还是国内整体高等教育,都应本着把“池子”做大、做深的原则。“大江大海”不仅更有利于人才涌现,其培养出的人才也会避免“温室”的局限,胸襟更宽广、眼光更深远,也更有资格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石。